

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

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它一直被人们所重视，也有过不少争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不少进展，但许多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有些事实也需要考订清楚。下面就太平天国在各个不同时期与天地会的关系做些分析。

一、起义酝酿时期

自 18 世纪下半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已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延绵不绝，联系和发动人民斗争的秘密结社，像燎原星火，遍布各地。天地会就是活跃在南方的一大秘密结社系统。它在清乾隆年间首先出现于福建漳州地区，到嘉道时（即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中叶），已遍及福建、台湾、两广、湖南、江西、云贵等广大地区，还传到南洋。有人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初步统计，从 1789 年到 1835 年这 40 余年内，具有相当规模的人民起义达 561 起。^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人民群众除了受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外，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鸦片战争战后 10 年内，人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了 1 倍以上，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无数散兵游勇无以谋生。他们加入秘密结社，如水赴壑，随处可见。南方天地会势力飞速发展：在广东，“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②；在

^① 参见 C. K. Yang, “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② 曾望彦：《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



广西，“拜台结党，旗帜各编堂名……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①，谢兴尧根据《堂匪总录》等书统计，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广西天地会堂股名称有120多个^②；在湖南，“结党成群，啸聚山谷”^③。从1836年到1855年这20年内，以秘密结社为中心的人民反抗斗争达1217次。^④斗争的锋芒不仅指向封建统治者，也指向了外国侵略者。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夕，两广、湖南的天地会不断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使清朝统治者发出这样的哀鸣：“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即将溃烂……终必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1月写的《国际述评》中，对鸦片战争后10年内中国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反抗斗争，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贫穷和另一部分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民的反抗、造反，主要指天地会起义；他们所言的“暴力革命”，就是后来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那么，天地会的斗争就是它的前驱。天地会为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天地会的广泛起

①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② 参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三联书店，1950。按：《堂匪总录》等书记载错综凌乱，谢先生的统计为读者了解堂股名称提供了方便，但应指出，这个统计似乎还有差错之处，例如，1852年同胜堂一栏（见该书第42页）原分为复汉、山义、结义、忠义、公义、连义、园明、广寿、同胜9堂，至1855年9堂才合并（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6，1~4页），谢先生只统计了同胜堂，虽在山义堂栏备考内注明9堂联合，但总的统计中9堂名目未统计入内。

③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1，《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④ 参见C. K. Yang，“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⑤ 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6，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使他们力量分散，疲于奔命，无暇顾及拜上帝会的初期活动，因而太平天国起义才有可能在思想上、组织上做较充分的准备。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以后，就深入群众进行组织发动，通过六七年的艰苦工作，为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1851年，清廷对拜上帝会的活动和它的领导者，仍茫然无所知，这说明天地会的斗争，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其次，太平天国起义在准备时期吸收了大批天地会的力量。由于高涨的起义形势，由于拜上帝会的主动争取，许多天地会分子加入了拜上帝会，如秦日纲带到金田去的千余龙山矿工，大多是“拜会结盟”的天地会成员^①，罗大纲、苏三娘等更是率整部天地会起义军参加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更重要的是，天地会长期以来的斗争，为太平天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说太平天国在思想上、组织上曾以农民革命空前的高水平和新面貌出现的话，那么，首先应该看到它是从天地会那里得到了宝贵的借鉴。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就记载了洪秀全评论天地会的一段重要谈话：“我虽未曾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如果我们讲真道理，而倚靠上帝强有力之助佑，我们几个人便可比他们多数。甚至孙臬、吴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历史中之嫫于韬略战术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赞，三合会更卑不足道矣。”洪秀全对天地会重大弱点的批评是中肯的。在这里，他首先总结了天地会在斗争纲领、口号方面的缺陷，指出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反清是对的，复明就不合时宜了，起义的目标应当是“开创新朝”。鉴于天地会的这个根本弱点，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发动太平天国革命时，首先就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纲领、口号，在他的一系列理论宣传作品中，一面无情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现实社会“陵夺斗杀”、“尔吞我并”的黑暗；一面则明确提出要通过起义，推翻

^① 参见梁崇鼎：《贵县志》卷11。



清王朝，建立一个“强不犯弱，众不暴寡”，“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其次，洪秀全指出了天地会的一些恶习，如拜魔鬼邪神、入会要钱、烦琐的仪式和誓词等。^①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就打破了天地会崇拜多神的传统，确立只拜上帝，并采用简便的仪式，规定了十款天条，严格禁止拜邪神、赌博、吸鸦片、奸淫等恶习。洪秀全还规定“凡三合会人们，如不舍邪弃旧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②。这应该说是太平天国早期对待天地会的一项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太平天国对天地会既实行联合，吸收天地会的力量，又严格要求，坚持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原则。这个政策是出于起义斗争的需要，是比较符合群众要求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囿于宗教成见”。事实上，它对太平天国统一思想、加强队伍的组织纪律起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一点，从广西的调查资料，也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金田起义之前，当地人民“有拜上帝的，同时也有拜三点（即三点会——引者）的”。由于“拜三点的人，到处打家劫舍；拜上帝的人不抢人，不打劫，买卖公平，群众拥护他”；而且“拜上帝不用钱，拜三点要钱；拜上帝的人宣传拜上帝的有饭吃，将来入了朝大家有福享”。所以，“大家都愿意参加拜上帝会，原来的三点会分子也多被拜上帝会吸收去了。尤其桂平的江北岸，从大湟江口至新圩、三江一带，一时不见了三点会活动的踪迹”^③。

天地会的另一根本弱点，就是组织分散，山堂林立，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明的纪律，在斗争中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个弱点也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所重视。洪仁玕曾指出，天地会“聚散无常，漂流靡定”，所以“官兵奉令剿捕”，“亦常奏功”^④。杨秀清在《天情道理书》中还特别提到广东天地会陈烂屐和广西天地会陈亚贵的起义，指出他们“肆行无忌，残害人民”，“图逞一日之豪强”等纪

① 据我所见的资料，天地会在乾隆年间结拜方式很简单，嘉庆年间天地会流传的会簿内还没有三十六誓，传布到南洋一带以后，天地会结拜仪式就愈来愈复杂，有三十六誓、七十二律等，而且三十六誓的条文也各有异同，无产者的恶习也愈来愈严重，参见有关档案资料；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英〕司托丹（Stanton）：《三合会史》（*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League*）；〔英〕活特、斯特林编著：《洪门》（*The Hung Society*）；〔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六）。

③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84~85页。

④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律败坏的情况。这是太平天国吸取天地会的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太平军“聚而不散”^①，指挥统一，“军律极严”^②，“队伍之制，条目井井”^③，与天地会起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太平天国不单吸取了天地会的教训，同时也采纳了它的某些长处，特别是在思想制度方面，继承发展了天地会某些有益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外许多学者做过探讨。这里只提一下太平天国在土地纲领和圣库制度方面受到天地会的启发和影响。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之前，无论是天地会还是太平军，都已提出了分配土地和改革私有财产制度的要求，而天地会所提出的要求则更早。再拿圣库制度来说，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广西的一些天地会组织已实行一种“米饭主”制度。凡是米饭主，都开堂设馆，无衣无食的贫苦农民破产劳动者投奔米饭主后，就由米饭主管饭食。而在组织内部，所得财物则完全归公，还必须严守纪律，服从指挥。杨西安就是广西天地会势力中最大的一个“米饭主”，他“有众数万，曾先后攻陷平乐、富川、恭城等处”^④。另外像凌二妹、邱二嫂还是势力很强大的女米饭主，邱二嫂后来率领数千加入了太平天国的队伍。而太平天国方面，在金田起义前夕，也已实行了“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⑤的公库制度（即圣库制度）。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就是继承并发展了天地会的‘米饭主’制度”^⑥，我以为是符合实际的。也有一些同志从圣库制度与米饭主制度之间的差别，以及他们出现的时间、地点方面表示过异议。我以为，说圣库制度是继承发展了米饭主制度，并不排斥两者的区别。从出现的时间、地点来看，据清朝官书记载，最早的米饭主似乎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河池州的韦世尧、韦世贵。^⑦但不能认为在此之前就不存在米饭主制度，也不能认为当时只存在于河池州地区。实际上，1850年以前广西连续发生灾荒，社会极度动荡，广大贫苦农民、饥民迫切要求解决生存问题。作为破产劳动者平时生活上互助的天地会，大量出现米饭主是很自然的，不过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太少罢了。

①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② 陈徽言：《武昌纪事》。

③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④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⑤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⑥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⑦ 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3。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能及时体察人民的要求，将前人及现实斗争中提出的光辉思想、战斗口号，不断加以总结提高，终于形成《天朝田亩制度》这样一个包括土地、财产分配等各方面内容的，动员千百万农民起来斗争的伟大的纲领。

太平天国以天地会斗争为借鉴，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天地会不能比拟的新水平出现，就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太平天国革命与天地会斗争最本质的历史联系，是我们考察太平天国在革命准备时期与天地会关系时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对天地会实行争取联合的政策，吸收了天地会的大批力量，使革命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拜上帝会与天地会有教义方面的不同，但他们的阶级基础、起义要求是一致的。过多的强调他们教义的不同，忽视他们联合的根本基础，是不妥当的。太平天国在争取联合天地会的过程中，坚持拜上帝会的教义和严明的纪律，无疑是正确的，不是“囿于宗教的成见”。这是我们考察这一时期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胜利进军时期

从1851年1月金田起义，到1853年3月定都南京，这是太平天国胜利进军、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与天地会有何关系？

过去，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即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时曾一度与天地会联合，到1852年4月太平军永安突围，天地会领袖洪大全被捕牺牲后，太平天国就拒绝天地会的加入^①，把洪大全视为决定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分合的关键人物，将洪大全的被捕牺牲作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分合的临界点。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同志根据大量资料，证明这种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②因

^① 持这种看法的，新中国成立前以萧一山为代表，见萧一山：《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跋》。另外，美国人海尔（Hail）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Tseng Kuo Fan and Tai-Ping Rebellion*），法国人卡勒与伊凡（Callery and Ivan）合著的《中国叛党起源志》（*L'in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n*）也持此见。新中国成立后以荣孟源为代表，见荣孟源：《天地会领袖洪大全》，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50。

^②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此，把洪大全看做决定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人物，将洪大全被捕牺牲说成是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分合的临界点，是没有根据的。（有关洪大全问题的考证，见本书《关于洪大全的身份》一章。）

实际情况是，无论洪大全被捕以前还是以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都是合作的，洪大全被捕牺牲并没有影响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合作关系。在太平军永安突围以后的胜利进军过程中，天地会对太平天国作了更大的支援。且看事实：1852年4月太平军永安突围后，由广西进入湖南，在蓑衣渡遇伏，遭受重大的损失。当时，由于湘南大批天地会会众的加入，队伍迅速得到补充扩大。据李秀成说，“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两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①；清朝将领江忠源也说，太平军“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②。据罗尔纲同志估计，太平军在湘南吸收天地会会众5万多人，相当于太平军进入湖南前的10倍^③。其中有道州、郴州一带许多挖煤工人，太平军将他们组成土营，成了后来攻城攻坚的有生力量。太平军过醴陵攻长沙时，浏阳天地会周国虞组织了征义堂，率会众2万余响应，并与太平军潜通消息，积极联络。西王萧朝贵进攻长沙，由于得到周国虞的密信，详知清军虚实，乘其不备，一举全歼伊培杰2000余人。^④太平军克益阳，取岳州，又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天地会的力量，其中有数千船民、水手、纤夫，太平军将他们组成水营，在东下江南的水路进军中起了重要作用。太平军至武昌，“湖北之奸民皆从之”，“旧钟人杰之余党十余万人来投降”^⑤，队伍扩大到50万，抵南京，就扩大到100万。

值得注意的是，永安突围前后，天地会在支持响应太平天国的态度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永安突围以前，太平天国对天地会是积极争取的，天地会对太平天国总的来说是支持的。但有不少率部加入太平军的天地会会首，到后来除“罗大纲留在洪军不去，因彼正爱其军律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外，有的“藐视”太平军的力量，有的不

① 《李秀成自述》。

② 《答刘仙霞书》，见《江忠源遗集》卷1。

③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60页。

④ 参见《湖南省志》卷1，34页。

⑤ 汪士铎：《梅翁笔记》。

愿受太平军的纪律约束就脱离太平军，有的还投向清军。像“大头羊、大鲤鱼及其他五匪首率众离开，后来投降官军，转而攻洪军了”^①。但是，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几乎看不到类似情况的发生。天地会不仅踊跃投向太平军，“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②，而且还纷纷假借太平军的名义来号召，有的贴出告示，号召人民与太平军“同心协办，共襄义举”^③；有的打出“太平天王”^④的旗号。正如曾国藩所说，他们“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⑤，太平军还在湖南时，武昌城内即出现天地会《总理军机镇守湖北大司寇郭》的布告，号召人民起来响应太平军，杀敌立功。^⑥太平军水陆东下江南时，江南一带天地会也都纷起响应，皖南宁国府天地会以“特授开国军师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清”的名义发出安民告示^⑦，南京贴出《天地会诏书》，表达了他们对太平军“箪食壶浆迎至者喜其先至，翘首引领望之者恨不速来”的心情。^⑧

为什么永安突围前后天地会的态度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呢？为什么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天地会如此热烈响应和支援太平天国呢？我以为，一方面是由于太平军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太平天国对天地会有效地实行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对天地会会众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天地会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促进了这种转化。

前面已经提到，太平天国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对天地会已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一面有效地争取和团结了大批天地会的力量共同起义；一面对张嘉祥等部叛变投敌，对陈亚贵等部“奸邪淫乱”、败坏纪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起义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太平军进驻永安时，仍有许多天地会分子倒向清营，充当壮勇，来围攻起义军，给太平军造成了许多困难。太平天国领导者们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公开揭露和积极解决问题。太平军在永安就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明确告谕“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也”，公开批评了广西某些天地会公然违背起义宗旨，认敌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② 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③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19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

④ 《文物》，1959（5）。

⑤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1，《移驻衡州折》。

⑥ ⑦ ⑧ 参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252页。



为友，充当壮勇的严重错误。到湖南以后，太平军又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三篇檄文，对天地会转变态度，积极投向起义，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太平军实行了以“均产制度”为中心内容的起义纲领。洪仁玕早就指出，太平军“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①。清朝官员的报告也屡称：太平军“到处遍张伪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②。“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③。所以，广大贫苦农民、天地会群众盼太平军如大旱之望云霓，太平军至，“争迎之”^④。太平军进占南京以后，上海的一家英国报纸刊载有这样一段报道：“太平军首领自豪地宣称：我们经过每个地区，人民欢迎我们就像欢迎及时雨一样，我们的旗帜打到那里，人民就像从巨大的灾难中获得重生。”^⑤生动地反映出太平军在胜利进军过程中深受人民群众包括天地会欢迎的盛况。

三、定都南京时期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农民起义的积极性。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天地会的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首先表现在斗争的规模、坚持的时间多超过了从前。比较著名的起义有：1853年黄德美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刘丽川等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广西天地会胡有录、朱洪英起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红巾军”起义。其中林俊起义，胡有录、朱洪英起义都坚持了5年之久。“红巾军”起义会众数十万，风暴席卷广东全省，蔓延广西，波及湘赣，坚持达7年之久。这些起义在较大的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廷，对太平天国政权是个有力的支持。

其次，斗争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② 《吉尔杭阿禀稿》，摘抄自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陈列室。

③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

⑤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3-06-18。

(一) 比较普遍地封王建政。太平天国之前的天地会起义，常常表现为流寇主义，旋起旋灭，飘忽无常，很少建立起政权，更没有称王封王的情况。有的起义虽然占领相当大的地区，但他们的首领一般只称“元帅”、“都督”之类，即使像规模较大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建立政权以后，也只称“总统开国大元帅”、“顺天大盟主”^①。但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特别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许多天地会起义开始称王建政，封王建国。如广东陈开、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1855年进入广西以后就建立了“大成国”，改浔州为秀京，以“洪德”纪年。陈开称“镇南王”，后改称“平浔王”，李文茂称“平靖王”，梁培友称“平东王”，区润称“平西王”，并广设官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② 胡有录、朱洪英起义，1854年攻占灌阳以后就建立“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录称“定南王”。^③ 有些起义虽然没有建国，但一般也多称王，如广西的罗德全称“定国王”，湖南何贱苟称“普南王”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认为是天地会斗争史上的一个进步，而这种进步正是太平天国革命直接影响的结果，也是天地会学习太平天国的一个具体表现。

(二) 比较普遍地打起太平天国旗帜或改用“太平”称号。前面已经提到，太平军在向南京进军过程中，许多地方的天地会已开始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号，借用太平军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这种现象就更为普遍。有的以“太平天国殿前都督大元帅”名义号召，如1854年湖北崇阳的陈北斗起义。^④ 有的“蓄发变服，遍张伪示，用太平天国年号”，如1857年广西上林李锦贵起义。^⑤ 有的干脆号“太平天国”，如广西的黄金亮。^⑥ 奉号改号改元“太平”的更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在1853年9月7日起义建立政权的当晚，刘丽川就正式宣布，起义政权“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⑦。15日，刘丽川

① 《林爽文起义布告》。

② 参见苏凤文：《平桂纪略》卷2。

③ 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344页。

④ 参见上书，241~242页。

⑤ 参见苏凤文：《平桂纪略》卷2；苏凤文：《股匪总录》卷1。

⑥ 参见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⑦ 原载《北华捷报》，1853-09-10，转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还向各国领事公布：起义政权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①。接着又将“大明国”正式改号“太平天国”，刘丽川自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②。他向天王上奏，自称“未受职臣刘丽川”，呼洪秀全为“我皇上陛下”。他在《致各国领事函》中，称洪秀全为“吾太平王”，又称“本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③。以上反映了各地天地会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太平天国的领导地位，反映出他们效法和敬仰太平天国。他们知道，只有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号，或投奔太平天国，斗争才更有力量，才能找到出路。

（三）斗争纲领、目标有了明显的进步。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集中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具体勾画出他们所要建立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蓝图，对广大贫苦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天地会的斗争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面提到，早在太平天国之前，天地会已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均贫富和分土地的要求，但往往是不具体不很明确的。《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以后，有些天地会起义就提出了同太平天国类似的要求。在《陈开自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起义是为了“同打江山，有饭大家食，有钱大家使，有衣大家穿”。起义爆发后，他们“所到之处，出示安民，商人乐业，无田者各给其田”^④。后来，广西天地会《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更明确提出“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畚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之后，仍照旧制，田主不得借故收租”^⑤。陈金刚发布的告示提出了“天下之田地钱粮皆我之田地钱粮”^⑥的口号。1856年，湖南澧州陈正卯、陈庭杰的“穷团”起义，提出了“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⑦等口号。同年李文学在云南哀牢山起义，提出了“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薄赋二蝗（成），荒不纳”^⑧的土地政策。发生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在他们的文告中也宣布“赋税钱粮全行蠲免”^⑨。

① 原载《北华捷报》，1853-09-10，转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62页。

② 同上书，609页。

③ 同上书，17页。

④ 转见《光明日报》，1962-03-28，史学版。

⑤ 转见《光明日报》，1955-09-29。

⑥ 原载1960年编《岑溪县志（初稿）》上册，转引自钟文典：《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在思想制度上的关系》，载《广西日报》，1961-05-03。

⑦ 《湖南省志》，第1卷，65页。

⑧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⑨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28页。

(四) 担负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任务。天地会同太平天国并肩战斗，共同打击侵略者，表现得也很明显。他们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当外国侵略者对起义进行破坏和武装干涉时，他们挺身而出，进行反击。1854年“红巾军”起义围攻广州时，英、美、法等国的侵略者，将大炮、火药、粮食运进广州城，接济清军，起义军首领陈显良即照会三国公使抗议：各国“每以舢舨等船用米盖住火药，载运进省……卖与奸官，殊乖正理。愿各大国自今以后，禁止舢舨装载火炮、火药、粮食等物卖与奸官所用，及以火船载渡奸兵进省”^①。1855年2月，陈显良在致英国公使包令（Bowring）的信中，还愤怒地谴责了偷运军火入城的外国人，并勒令他们立即离开广州。^② 1855年1月，法国侵略者进攻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坚决还击，杀死法军13人，杀伤30余人，击毙清军2000余人。^③ 后来，天地会布兴有部、小刀会潘起亮部在浙江宁波、余姚一带，同太平军并肩痛击侵略者，打死了“常胜军”头子美国人华尔。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天地会这些显著的进步，是在太平天国的直接推动和影响下取得的。

过去史学界曾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太平军进军江南定都天京以后，就不再同天地会合作，天地会也“和它分道扬镳”，似乎太平军对天地会的政策根本改变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对天地会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在起义的高潮时期，对天地会曾做了许多联络策动工作，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援助。从上海小刀会起义，可以看得很清楚。起义之前，太平天国就派李闻凤前往联络。起义发动后，刘丽川即上奏天王洪秀全，表示愿归附太平天国，并要求“早命差官莅任，暨颁赐誉黄，以顺天心，以慰民望”^④。这个奏章并没有送到天京，所以东王杨秀清又下檄李闻凤通知刘丽川等，希望他们“率众来归”^⑤。1854年6月，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再次表示欢迎上

①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14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② 参见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California, 1974, p. 147.

③ 参见 [英] 斯嘉兹 (Scarth): 《在华十二年》，译文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④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2页。

⑤ 知非子：《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四），626页。



海小刀会归附太平天国。^① 据当时在上海亲历过这次起义的英国人斯嘉兹说：“他们（指上海小刀会）希望参加南京的太平军，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见过两封南京写给他们的信。”^② 在此期间，罗大纲还在“仪征各码头置造皮蓬小船六百只”^③，准备冲过清军水营，直下上海，以接应上海小刀会。但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军事斗争形势比较困难，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却说明，太平天国并没有“拒绝刘丽川的加入”，而是主动地争取和准备赴援的。

同样，太平天国对其他地区的天地会起义，也是积极支援的。1853年小刀会在厦门起义，太平军给他们送去了金钱与火器。^④ 1854年，杨秀清又派徐向荣入闽联络正在起义的天地会。^⑤ 红钱会首领林俊在福建中部起义，不仅与太平天国有联系，而且受封为太平天国的“烈王”^⑥。1854年广东“红巾军”大起义，太平天国曾遣密使前往联系，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七日上谕说：“江南逆匪，潜遣伙党回粤，勾结丑类，同谋滋事。”^⑦ 据说，在起义前，李文茂曾会晤过“天主”的密使。^⑧ 与此同时，罗大纲还派了卓杰生去广东与何六、陈金刚联系，上海小刀会刘丽川也派了刘杜川去佛山与陈开、李文茂约期起义。^⑨ 1854年夏，裨治文（Bridgman）访问镇江、南京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告诉他：“在广东省及广州城内，他们的真朋友、真兄弟数以千以万计。”^⑩ 以上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同这些起义的亲密关系。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对天地会除了联络争取和支援工作以外，还在一些地区实行组织上的联合，协同作战。例如，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罗大纲曾写信给在湘桂地区战斗的天地会首领胡有录，要他率部“前往会合”，即到天京会合。胡有录便“下令蓄发，自称定南王”，联合朱洪英部，决意北上^⑪，虽然胡有录因遇

① 参见《文史》，第1辑，72页。

② [英] 斯嘉兹：《在华十二年》，第20章，译文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546页。

③ 《忆昭楼洪杨奏稿》，第4册，《丹徒县稟》。

④ 参见[英] 柯文南：《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及其他造反者》。

⑤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⑥ 有的记载说“秀全遣使封俊为顺义侯”，见《逸经》，第35期。

⑦ 《东华续录》卷39。

⑧ 参见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见《广东文物》卷8；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

⑨ 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962页。

⑩ 《大风》，第92期。

⑪ 参见《骆秉章奏议》卷4，《东安窜贼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首逆折》。



害未能到达天京，但却反映了双方决意联合的趋势。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初二日骆秉章在《两广贼匪同时犯界各路均获胜仗折》中说，在湘南一带，“夺获镶黄大旗一面，太平后营龙凤旗一面，伪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一面，公义堂旗、太平后营旗、朱洪英大黄旗共数十面”^①。罗尔纲同志认为“太平天国将军刘的大黄旗、太平后营旗乃是太平天国的旗帜”，是正确的。但他说：“这一件事实，说明了在公义堂、朱洪英等天地会党起义军里面，太平天国是派有干部进去联络他们，策动他们的。”^② 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不如说是太平天国同天地会联合或协同作战的反映。因为我们看到，在同一个时间里其他地区也有这种情况，例如，1855年后，广东天地会周培春、葛耀明等部入江西，就加入了太平天国队伍，他们同时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却打出了不同的旗帜。同样，在广西也有类似的情况。据《堂匪总录》记载，黄福东“咸丰三年三月附发匪黄满，踞奉议州，又踞啼露村，与土匪黄麟合股，十月与陈兴富同勾广匪窜扰百色”^③。又，“咸丰四年闰七月，客匪刘桂纠长发数千人，由贺县入苍梧公会墟，与平安、福胜、洪兴各堂土匪合为大股”^④。以上，有的是出于太平天国政策的指导，有的应是下层群众自发的联合。

四、太平天国衰败时期

1856年秋韦昌辉在天京作乱，1857年石达开裹胁太平军精兵10余万公开分裂，它们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此，形势急转直下，虽然洪秀全、洪仁玕及广大将士为挽救危局做了极大的努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衰败的趋势。太平天国后期与天地会的关系，也是受这个总趋势制约的。

过去，罗尔纲同志曾提出，太平天国乙卯五年（1855年）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广东天地会加入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他没有对这批

① 《骆秉章奏议》卷2。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62页。

③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4。

④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6。



天地会部队进行改编、教育、改造，后来便造成破坏纪律、不听指挥、发生叛变三大恶果。^① 罗尔纲同志指出的这个现象是很重要的，但人们还会问，为什么石达开没有整编改造这批天地会部队？三大恶果又是怎样造成的呢？这些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清楚，因为太平天国后期，南方很多地区的天地会与石达开及其部众发生过关系，弄清这些问题，可从一个侧面认识这一时期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变化规律。

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天地会部队是在 1855 年冬天。当时，广东“红巾军”因围攻广州不下，一部分转入湖南，“合计不下数万，声言由湖北、江西与金陵逆贼会合”^②。1855 年底，葛耀明、陈寿、周培春、王崇开等部就在江西新昌与石达开会师，加入了石达开的部队。石达开当初接受这批天地会时，确实没有整编改造他们。主要原因是由于这批天地会部队数量很大，“犷悍不可制”，所以“乃阳示羁縻，令其自树一帜于江皖间”，“借以牵制官兵”^③。

由于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斗争形势有利，所以这部分天地会花旗军^④与太平军合作得比较好。1856 年初，江西太平军与天地会“花旗军”在石达开的指挥下，连续攻克袁州、瑞州、临江、新喻、万载、吉安、永丰、抚州，占领了江西广大地区。清朝统治者惊呼：“江西全局岌岌”，“大势已去也”^⑤。曾国藩困守南昌，成了瓮中之鳖，惊慌失措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⑥的地步。接着，石达开奉调东进，配合天京方面打垮了江南大营，形势大好。

不幸，就在这年秋天，发生了天京变乱。形势剧变，江西战场也陷入了困境。曾国藩乘机调集湘军 10 多万人分数路反攻。因为大部分太平军老战士已被石达开带走，留在江西的大多是当地新加入太平军的群众和天地会“花旗军”。这些人缺乏锻炼，战斗力不强，面临困境时，经不住考验。当时，江西的许多重镇都由这部分太平军和天地会“花旗军”联合防守，在湘军全面进攻面前，“花旗军”

①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② 《骆秉章奏议》卷 4，《永兴茶陵失守分路剿办情形折》。

③ 夏燮：《粤氛纪事》。

④ 这批天地会部队保存了原来的组织和旗帜。因所用旗帜多花色，故称之为“花旗军”。

⑤ 《左宗棠全集·书牒》卷 2，《与王璞山》。

⑥ 《曾国藩全集·书牒》卷 4，《与彭九峰》。

与太平军因指挥、供给等问题而发生间隙，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曾国藩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广东新附之贼与真长发不合，看此岂可以长久者，吾辈若更坚忍数月，似当有豁然贯通之一日。”^①因此，湘军在攻袁州时，就采取了“断接济，觅内应”的策略，即一面截断太平天国对袁州的一切接济通道，一面对城内守军日夜环攻，并“射示城中，长发贼能杀广贼投诚者免死，广贼能杀长发贼投诚者亦如之”。在离间下，守御袁州的太平军首领黄毓生与天地会“花旗军”首领李能通就“各怀疑惧，互相猜贰”^②。1856年11月就发生李能通献城投降的事情。湘军进攻瑞州、临江、九江、湖口、吉安、饶州、抚州、建昌等城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到1858年9月，在守卫江西最后一个据点吉安时，太平军与“花旗军”还在“互相哄斗”^③，湘军便乘机迅速攻陷吉安。

正当太平军在江西战场节节失利的时候，石达开裹胁了10余万精兵，离开天京，独树一帜，1857年底从安庆进入江西。这时，由于他自立门户，尽管手握重兵，却没有挽救江西危局，更谈不上整编改造天地会部队。他退出江西之后，太平军在江西的根据地很快就全部失守。

以上就是石达开没有整编改造天地会部队的原因，以及三大恶果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

天京变乱以后，就石达开对待天地会的态度及与天地会的关系来说，变化是很明显的，他退出江西以后表现得就更为明显。1858年石达开从江西退走，辗转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他盘旋浙、闽一年余，处处失利，军心涣散，士气低沉，以至自相杀戮。从1859年春到1861年底，石达开在广西辗转了三年多时间。当时，广西天地会的斗争如火如荼，很多队伍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陈开建立的大成国，地辖浔州、梧州、柳州、南宁、思恩、庆远、平乐等府县，朱洪英也建立了“升平天国”，还有张高友、陈金刚、罗华观、吴凌云等部，都在广大范围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石达开进入广西时，天地会各部是欢迎的，他们配合石达开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如石达开的部将陶金汤在张高友的配合下，攻克了阳朔、永安。石镇吉部在李锦贵、谢秉坤等配合下，占领了宾州、上林；又在李

① 《曾国藩全集·书牒》卷4，《与李次青》。

② 《骆秉章奏议》卷8，《援江官军克复袁州分宜郡县两城折》。

③ 《骆秉章奏议》卷13，《援江官军会克吉安府城折》。



文彩的配合下，攻百色厅。黄鼎凤在贵县、吴凌云在陇罗，都尊奉石达开为领导。但石达开并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他到处活动，争夺地盘，同天地会发生冲突，以至火并。例如，1959年11月，就发生了天地会张高友杀陶金汤的事。据《平桂纪略》载：“金汤既攻破阳朔、永安，结莲塘张高友为助，高友利其所有，诱杀之。”^①封建统治者将这件事歪曲为谋财害命，《永安州志》也载“嗣因张逆探悉陶逆资财，起意吞并，遂于黑夜率匪将陶逆杀戮”^②，其实反映了两支起义军的关系。就在这同一记载中，我们看到，张高友杀陶金汤之后，“逼其众归张统辖”^③。至少说明天地会张高友部与石达开部在统属关系上存在着矛盾。又如，石镇吉进占宾州时，“带党十万有奇”^④，“逐去黄三（即黄鼎凤），入踞州城”^⑤。由于他逼迫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部离开，强宾夺主，双方就对立起来。石镇吉占上林城时，大成国澄江（上林之改名）知县李锦贵即脱离大成国而投石镇吉，石镇吉又立即“封李锦贵为澄江县大令”^⑥，与大成国又发生矛盾。在此期间，石达开还派人劝说陈开投奔于他，说什么“尔大成洪德，不能成事，如果敬拜上帝，我与尔合”，结果遭到陈开的拒绝。黄鼎凤等人“也仍要大成洪德，不愿拜上”^⑦。这些都反映出石达开因抢占地盘而与大成国之间的矛盾。

随着石达开力量的日益衰落，太平军将士纷纷起而反对他，吉庆元等率部“万里回朝”^⑧，是个突出的例证。另外，石达开部将张志公、余成义、李青靛等接连叛降清军，在众叛亲离之下，石达开想靠广西天地会来支撑已不可能，最后率残部入川，全军覆没。

从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天地会部队，到他出走天京辗转南方各省与天地会关系变化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京变乱之前，石达开到江西是为太平天国开辟根据地，在起义高潮中，石达开接收了大批天地会“花旗军”，虽然一时未加整编改造，但在共同目标下，总的来说合作是好的，天地会部队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天京变乱之后，由于各种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太平天国走向

①② 苏凤文：《平桂纪略》卷3。

③ 《永安州志》。

④ 《宾州志》卷13。

⑤⑥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1。

⑦ 《陈开自述》。

⑧ 《吉庆元、朱衣点等上天王奏》。



衰败。特别是石达开走上了分裂道路，根本方向是错误的，因此，太平天国的各项政策已不可能由他来贯彻，太平天国积极争取联合天地会的政策首先就被他破坏，他排斥闽浙赣地区天地会、千刀会的归附，还抢占广西天地会的地盘，就是明证。所以，尽管石达开带了10多万太平军辗转南方各省，但各地的天地会没有也不可能从石达开那里找到真正的援助和出路。

太平天国后期分散主义等倾向愈来愈严重，这是农民、小手工业者阶级弱点的表现，是起义走向衰败的重要标志。就拿江南来说，李秀成在苏杭地区搞独立王国，公然“逆主之命”^①，是很突出的。同时在他周围的一些太平军将领，如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黄文金、古隆贤等，也各占山头，各自为政，各有自己的军队和号令，形成了天京与地方之间互相隔阂，各地山头之间“彼此猜疑，势不相下”^②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天朝也就失去了权威，指挥失灵，政令不一，在处理与天地会的关系方面，也就没有统一的政策。因此，同在江南地区，各部太平军与天地会关系也各不相同。例如，在浙江，浙东太平军黄呈忠、范汝增部与当地天地会的莲蓬党就合作得比较好。1861年莲蓬党起义，积极配合黄呈忠、范汝增部进占宁波、绍兴，起义军首领何文庆后来还率领莲蓬党加入了太平军，在诸暨、余姚、镇海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何文庆还得到太平军“志天义”的封号。^③与此同时，余姚一带的天地会起义军接应太平军，攻克慈溪，打败“常胜军”，击毙了华尔。^④但是，1861年浙江南部爆发的金钱会起义，却没有得到太平军的支援。金钱会起义之后，起义军派10人前往太平军李世贤部求援攻打温州，太平军回答他们说：“汝等已将那城自行掠空，因官兵厉害，求救于我，令我取已空之城；我欲取城池，何待汝等请！汝等先抢，又来招我，大属可恨！”并且“立斩八人”^⑤。又如，在浙西战场上，1862年太平军李世贤、洪春元部与天地会“花旗军”谭星、谭体元、陈荣等部发生冲突，特别是太平军李仁寿部与天地会陈荣部火并，给左宗棠以可乘之机，至1863年，太平军在浙西的防御体系即迅速

① 《李秀成自述》。

②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攻剿龙游、汤兰、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及各要隘折》。

③ 参见许瑶光：《谈浙》。

④ 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

⑤ 聂崇岐编：《金钱会资料》，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瓦解。^①

总之，太平天国后期与天地会的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从总体上来看，已没有一个统一的积极联合政策，各个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合作的好坏取决于各地太平军将领和当地天地会的态度。从斗争的趋势来看，已不再像前期那样生气勃勃。尽管在局部地区的联合斗争颇有生气，但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衰落，在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这些斗争很快就失败了。

太平天国虽然走向衰落和失败，但尖锐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斗争是不会止息的。因此，到太平天国末期，一些地区的天地会势力却仍有扩大，贫苦农民大批“转红”（即入天地会），以寻找斗争的出路。有些地区出现“三十里内转洪（红）蓄发者至九十六村”、“五十余村皆长发转红”^②的情况。甚至不少太平军的余部也成批转而投向天地会的组织^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太平天国革命的规模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不能比拟的，太平天国同许多秘密结社起义发生了联系。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太平天国与天地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来自相同的社会阶级，遭受同样的剥削压迫，共同的斗争目标，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太平天国争取联合天地会的政策、更高水平的斗争纲领、严密的组织纪律，在争取联合和改造天地会力量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天地会对太平天国革命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援。但是，他们之间的联合是有限度的。在组织系统上，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等不时表现出来，并由此而发生冲突和分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是这样，与捻军等组织的关系也是这样。太平天国没有力量从根本上改造这些旧式会党，因为它本身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没有先进思想武器武装的农民革命。他们无法克服共有的阶级弱点，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

① 参见《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

② 光绪《玉林州志》卷18。

③ 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4；光绪《玉林州志》卷18。